

我如何成了一位有争议的作家(4)

——格拉斯诺奖演说

如果通过讲故事，还不能重新捕获一个即失去了又毁灭了的城市的话，那么，我至少可以重温旧梦。这种系念使我不断笔耕。我需要在自我和读者眼前把它变得清晰些。在我的肩上并不是没有留下一点碎片，失落的东西也不能湮没无闻，它可以通过文学的艺术而苏醒过来，因为这种艺术可以再现一切崇高和卑琐：一座座教堂，一片片墓地，船坞的嘈杂的声音，环绕波罗的海的扑鼻的暗香，一种早已扬蹄出征却依旧有伏枥之温情的语言，一种脱缰难收却满腹忧愁等待倾诉的语言，需要忏悔的罪孽，需要宽容的却似乎从未被赦免的罪过……

一种类似的失落感给其他作家提供了魂牵梦绕的题材的温床。在多年前我与萨尔曼·拉什迪的一次谈话中，我们一致认为，失去的但泽对我来说，就像他失去了的孟买一样，既是源泉又是垃圾坑，既是伤心别离地又是世界的肚脐。那种狂妄自大，那种滥杀无辜的场面，在每一种文学的心脏部位都可以见到。对于能够发现一切艰难险阻的故事来说，它是存在的条件。煞费苦心的细节，敏感的心理分析，描绘人生片段的现实主义——光靠这些技巧并不能处理好我们的怪异的原始材料。像我们这样受惠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传统的作家，对历史的荒谬进程的理解是成功的唯一解释，它摒弃了一切别的推理性的解释。

文学正从公众生活中撤退，我愿跪在西西弗斯面前祈祷

诺贝尔奖金，只要我们剥去它的典礼的盛装，就会看到它根植于炸药的发明中。人类思想的胚胎是随着原子的分裂而形成的，而荣获诺贝尔奖的基因分类研究给这个世界既带来了福祉又带来了悲哀。文学也是如此，它的根基隐含一种爆破力，尽管文学释放的爆

破力不是一种即刻的而是延后的行动效果，只有在时间的放大镜中才能改变世界，也就是说，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它都通过宣泄而发挥作用。

起颠覆作用的文学如何能做到既具有爆破力又具有文学性呢？还有足够的时间来等候这种被延误了的行动吗？将来，任何书都是为了提供一种短期消费的商品吗？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对于文学正在从公众生活中撤退，青年作家正在运用电脑联网作为游乐园这一现象，当做什么种解释？停滞不前的迹象日甚一日，这一点，可疑的 communication 一词已经透露了某些信息。每一次时代的故障停车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精神崩溃。文化工业的一次浸染着泪水的低谷正在向全球的每个角落蔓延。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尽管我不信神，但是，我所能做的一切不外乎跪在一个圣徒面前，因为这个从未使我失望的圣徒炸开了某些最硬的坚果。“啊，(多亏加缪的恩赐)神圣而崇高的西西弗斯！也许

你的石头不会停留在山顶，也许我们又一次把它滚了下去，像你一样继续为之感到高兴吧，也许，我们‘存在’的苦工是一个永远讲不完的故事。阿门。”

但我的祈祷会有人听到吗？或者，这些传说是真实的吗？新的无性系的生命的孕育注定能保障人类历史的延绵不绝吗？

饥饿还在蔓延，未来仍有东西需要讲述

这就把我带回到我在演讲开头说过的那番话。我再一次打开《雌鼠》的第五章，书中的实验室雌鼠，代表数百万在研究过程中的实验室动物，赢得了诺贝尔奖。而我则想到：几乎没有什么奖金曾经颁发给那些力求使这个世界摆脱人类一大灾患的科研项目——即根治饥饿的科研项目。任何人，只要付钱，就可以换两个新肾，心脏也可以移植。我们可以给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打无线电话。卫星和太空站令人不安地绕着我们循着轨道运行不



■ 格拉斯也是画家和雕塑家，这是他在为自己的《铁皮鼓》画插图

共和国记忆

李 菁

21.嗜好看书写字

在大会上，刘伯承把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刘弥群说，父亲这样做实际上也是想保护部下，但是事态的发展已不是他所能控制——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最后被撤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的干部蔡铁根大校看下去，没经任何人允许上台抢过话筒：“你们对刘帅的说法完全不是事实！”当场被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不久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军事教条主义再次被人提出来并遭到变本加厉的批判，已被逐出军队的蔡铁根大校在地方上被划为“现行反革命”而遭枪毙。会后，刘伯承被直接送到了北京医院。治疗期间，他还按工作组要求写检查。老友陈毅来看他，耿直的陈老总说：“你写啥子检查嘛！要我写替你写，写100个字就行了。”

1958年冬，刘伯承以身体原因，辞去军事学院院长一职，保留了军委副主席一职，赋闲在家。“这样也好，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看到爸爸。”刘蒙说。而从另一个角度，刘伯承也因这场“反教条主义”躲开了其后来势汹汹的政治运动。

1959年1月，刘伯承带着全家移居北京。离开之前，刘伯承反复命令部下，不许开欢送会，不许送行。在离开南京的那一天，到了渡口之后，刘伯承发现军事学院的许多干部早已集合在码头，自发为他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坚决不许大家送。等到他上的船要驶离时，那些军人齐齐向他敬礼致意……“我也跟着爸爸妈妈一道，看到这一幕非常震撼。”时隔五十多年回忆这一幕，刘蒙仍然心绪难平。当时，刘伯承只是久久地朝着人群挥手，刘蒙感受到父亲心中的不平静。望着老师在寒风中略显苍凉的身影，新任院长廖汉生感慨道：“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这顶“教条主义”的帽子，刘伯承足足戴在头上近30载，直到他离开人世。生前，刘伯承从来说过一句怨言，只是家人注意到他常常



一人默默地陷入沉思。妻子和子女们都难免觉得受了些委屈，而他的回应只有一句：“我刘伯承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的。”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去世，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有5000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上郑重宣告：“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刘伯承一生对烟酒无好，唯一嗜好是看书写字。赋闲在家的刘伯承生活很规律：每天早上5点起床，先读一段俄文——他有一个习惯，喜欢早晨起来上厕所时坐在马桶上大声朗读俄文，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他72岁双目失明为止；然后打一套自创的操，之后便开始写毛笔字。耳濡目染下，刘蒙也开始学书法，如今，刘蒙的另一重身份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不管每天工作有多忙，刘蒙依然会抽出时间读外文。追溯起来，早上出门上学时，“要么在大声念俄文，要么在练毛笔字”的父亲，早已悄悄地在少年刘蒙的心里种下了那些种子。

“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刘伯承家里电话旁贴有这样一张特殊的“告示”，这是汪荣华写给孩子们的。刘蒙说，父亲办公室一左一右两个抽屉，左边放的是私人信纸，右边放的是公文纸，如果是写私人信，父亲绝对不会打开右边那个抽屉用公家一张纸。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听到父亲跟母亲叮嘱：“我的私人信笺用完了，别忘了帮我买一点。”

孩子们都知道，父亲是爱他们的。刘解先说，父亲希望他们都长得漂漂亮亮的，怕孩子们长个塌鼻子，所以他经常捏孩子们的鼻梁，“我们每个都被他捏过”。但是，父亲对子女们的要求也极严格。刘蒙说，自己上学的时候，妈妈一分零用钱也不给，于是他每天都走路上学，把节约下来的八分钱车钱放到储钱罐里，等春天来了才舍得用攒下来的钱买风筝、山里红等。一直到上中学，刘蒙穿的都是姐姐穿过的女式旧军装，以至于被同学取笑。

1936年，刘伯承在长征途中与出身农家的汪荣华结婚，两人相携走过整整半个世纪。像那个年代的许多革命者一样，刘伯承夫妇也为我们的新政权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他们的大女儿刘华北。

十一、与徐楣丽一起双双探宝

李茗沁与琳娜李去了趟德累斯顿，参观茨温格皇宫里的中国瓷器，还去了欧洲瓷都迈森。两人关系更深入了一步。第二天搭上回国的飞机，脑子里回想着与琳娜李的浪漫之旅，当然更在回想前些天的险情。一到上海，就与秦汉见面。秦汉也觉得伯伦是个危险人物。这家伙太狠毒了，要是子弹偏一点呢，不是要了你的命？我猜测不会是这个

人，电话号码对不上，又没有像样的古董，他只是试探你，你被盯上了。我考虑你的安全，再去是不是合适？

徐楣丽打来电话，说想和他同去欧洲。他暗暗欣喜，苦恋她这么多年，终于有了回报，要日日夜夜在一起了，与以往今夜相聚明早分手的欢愉迥异。

到了阿姆斯特丹，李茗沁发现徐楣丽并不兴奋。来欧洲之前，克拉克娜把家传的部分图片发给李茗沁，李茗沁转发给秦汉、徐楣丽。徐楣丽看后说，太精彩了。过了一个月，就决定一块儿来欧洲。徐楣丽资金充足，如果合力去争取克拉克娜的货，把握大一些。之前，徐楣丽曾寄了一件唐代的素面银粉盒叫李茗沁转赠克拉克娜，克拉克娜惊喜地握住李茗沁的手，那怎么行，我无功受禄……你们需要我帮什么忙？李茗沁说，我们想买你那批家传的珍宝。克拉克娜耸耸肩，莞尔，这真有些为难，好多人看中这批货。李茗沁追问，好多人看中？克拉克娜迟疑半晌说，这批货我原来想给太平，因为他十分热爱中国艺术，甚至比很多中国人还热爱，又是绝对的中国文化专家，我已经给过他许诺。李茗沁沉默不语，这家伙从一开始打交道就是我的克星。克拉克娜说，当然，我的许诺不是很明确，只是说可以考虑他。她可能看出李茗沁的失望，就说容我考虑一下，你回国后，我先发一些图片给你看看，也请转给徐楣丽小姐，并转达我的谢意。

这显然是徐楣丽来欧洲最直接的原因。李茗沁并不考虑她出于什么目的，一起来欧洲旅行就可看做是两人关系的升华。虽然这两年自己在欧洲淘宝成绩不错，还帮她买了一些瓷器，但徐楣丽除了赞赏并没有特殊的表示。说实在的，如果没有这次机会，李茗沁

息。最近被构想被开发的武器系统，根据颁奖和获奖的原则，它们也有助于延缓其主子的死亡的逼近。

人的大脑构想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得到惊世骇俗的实践的运用。只有饥饿似乎还在令人难以忍受地忍受着，甚至正在日益恶化。根深蒂固的贫困逐渐化为一片愁云。难民正在云集世界各地，伴随而来的就是饥饿。如何根治这一巨大悲惨的现状，政治认识与科学认识应当达成共识。似乎没有人决心进行这一事业。

1973年，正当在美国的积极支持下，恐怖开始袭击智利时，威利·勃朗特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这是第一位德国总理站在联合国讲坛上。他提出了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他惊呼：“饥饿也是战争！”接着是掌声如雷。

他发表演说时我正好在场，那时我正在写小说《鲽鱼》。小说涉及人类存在的真正基础，尤其是食物——或极为短缺或相当丰富的食物，无数的忍饥挨饿的穷人和大腹便便的饕餮之徒，富人的餐桌上的美味和欢笑。

问题仍然纠缠着我们。穷人以增长的出生率抵销了增长的财富。富饶的北方和西方可以尝试在防御壁垒中隐蔽起来，但难民潮仍然会把他们席卷进来，因为没有一扇大门可以抵抗饥饿的挤压。

凡此种种，未来都会有某种东西需要讲述。我们共同的小说必须未完待续。甚至某一天人们不再写作不再出版或不得不如此时，仿佛书籍不再是有用之物时，仍然会有讲故事的人给我们做口耳相传的人工呼吸，仍然会用新方式来编织老故事：有时声音洪亮，有时气韵平和，有时诘问发难，有时踌躇不前，有时收敛笑容，有时泪珠盈眶……

(本文摘自《给诺贝尔一个理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精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傅正明译。有删节)

对她已不抱希望。即使在斯德哥尔摩度过了一个浪漫之夜，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琳娜李与他相拥一起，热泪盈眶，感动天地。而徐楣丽全然没有这样的表现，她始终是冷静的。许多年前，他与她在上海结识，那些相处的日子，她也是如此冷静。不久李茗沁离了婚，去香港与她相会，如果两人关系要升级，时机已经成熟，但徐楣丽只问，怎么有空来香港玩呀？

他这样想着，就对自己说，平常心看待这次旅行吧。

看荷兰的第三天，李茗沁与克拉克娜通了电话，说徐楣丽也来了，很想一起来看看那批珍宝。克拉克娜邀请他俩去她的店。他俩买了一束郁金香，克拉克娜在门口等着，边称赞花漂亮，边上前拥抱徐楣丽说，谢谢那件小银盒。李茗沁趁机强调说，徐楣丽特意来欧洲看这批货。克拉克娜说，好啊，你们都喜欢，我也高兴。本来准备给太平，现在我改变了主意，搞一个小型拍卖会，你来参加，公平竞争。

小车载着他们仨行驶了半个多小时，经过一座很漂亮的古桥，古桥上有人物雕塑，李茗沁试图记住这个地方，但一晃就过去了。几个拐弯，小车来到一条小道，司机下车，为他们开门。三人下车，朝前走去。只见小道上古木森森，从一间街面房进去，跨过几间屋，径直走向一条秘密通道，经过一间仓库一样的房子，然后看到了一座圆形古堡。徐楣丽看了看李茗沁，眼里分明有惊喜。来到里面一间小屋，克拉克娜说今天没有时间参观，先看看这批藏品吧，说着打开一个大箱子。他俩眼睛一亮，有不少宫廷官窑器，也有不少外销瓷精品。看了一会儿，克拉克娜说，今天只是粗粗地看，以后有机会的。

看了两箱瓷器，并没有见到元青花。李茗沁留意电话座机，想打一个试试，又怕克拉克娜起疑心。

坐上小车离开古堡，经过那座古桥，进入市区。一路上，徐楣丽不住地称赞这批货，两眼释放出少有的兴奋。李茗沁却两眼暗淡下来，意识到事情的复杂性，万一得到这批珍宝，徐楣丽跟我争夺，那怎么办？

蓬帕杜夫人的珍藏

程庸

